# 绪 论

对史学发展史的研究一向有两种取向：一种是学术史的研究取向，即研究史学学术发展演变的过程，如历史观、史学目的论、史学方法、历史编纂学等；一种是社会学的研究取向，即研究史学和特定时期的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前者研究的意义在于对史学学术工作进行总结，其读者对象大概只限于专业的史学工作者；而后者研究的意义，一方面是把史学作为特定时代社会思潮的一种折射，考察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对史学家治史目的、态度、方法、史观等方面的影响，另一方面则研究作为一种知识形态的史学是如何影响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可以名之为“史学社会学”。

历史学究竟属于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科，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认为史学是一种社会科学的，相信史学凭借不断扩张的史料，用所谓“科学”的方法，就能够解释人类社会现象，揭示事物的本质，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主张史学为人文学科者则认为，历史学决不是什么“科学”，它固然可以帮助人们了解自己的过去，供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充其量和文学、艺术一样，是一种陶冶性情、启迪心智的“人文学科”而已。还有一类主张则属于折中主义的，认为历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至于它离科学更近些，还是与艺术更相似，那就看你个人的喜好了。看来，只要史学作为一门学问还存在，关于其性质的争论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定就永远不可能停止。毋庸置疑的是，无论科学派还是艺术派，大家都承认：史学具有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

史学研究的价值在哪里？其功能又如何体现？这是每一个史学工作者都必须面对的意义追问。毋庸讳言，在市场经济大潮涌动和社会转型时期，史学绝对不再是什么“显学”（如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极端政治化的“影射史学”一样），它被“边缘化”是一种必然趋势。在当今世界，史学家不乏谋生的手段，但史学似乎难以成为谋生的手段，否则史学将不再成为“史学”。但历史学有其独特的价值所在，从小处说，人们衣食富足之后必然产生精神方面的需求，历史学当能满足人们对人类过去历史的好奇心；从大处说，历史学毕竟有经世济时的功用，比如：它能帮你恢复过去的记忆，从而确定你现在所处的方位，进而做下一步怎样走的打算。试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组织乃至一个学科，如果不了解自己的过去，则如同一个失忆者，他将面临很多的困惑。

笔者对抗战时期中国史家和史学的研究，正是怀有这样的期许——让我们的民族记住这段历史！

发生在 20 世纪 30 年代至 40 年代的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一段无法抹去的痛苦记忆。建国以来，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是中国史学界永恒的热点。关于战役、人物、国共关系的研究，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成果丰硕；对抗战文化的研究则以文艺界研究起步早，成果多；但遗憾的是，对抗战时期史家和史学的研究，史学界投入的精力和成果反倒不尽如人意。

有关抗战时期历史学的研究，较早当推叶蠖生在 1941 年发表在《中国文化》第 3 卷第 2 期上的《抗战以来的历史学》一

文，这是对抗战开始后中国历史学的一般趋向、包括抗战营垒中各学派的活动、日寇及其走狗利用史学的活动的首次概括性论述。此后，吴泽先生曾发表《中国历史著作论》①，尝试用唯物史观来评述抗战时几本较有影响的中国史著作；胡绳撰《近五年间中国历史研究的成就》，也曾对抗战时期的中国史学进行过初步总结。

广泛开展抗日战争时期史学发展史的研究，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事情，对各史学派别都有或多或少的研究性文章，系统的专门论著还没有。桂遵义教授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②一书中，对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颇费笔墨，其中自然涉及到不少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爱国史学思想和活动。但受其体例所限制，不能对抗战时期中国史学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其中对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家的论述较多，对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论述则不多见。

对其他史学派别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乏人问津，即使有，也因极“左”思潮的影响而将他们作为批判的靶子来研究的。陈垣一生著述等身，德高望重，桃李满天下，又辞世多年，因而学术界对他在抗战时期爱国史学活动的研究开展得比较早，但多为弟子对老师景仰、怀念式的评述，感情色彩颇浓。对于“禹贡学派”的论述也有类似的情形。禹贡学会成员回忆性的文字较多，专门性的研究论文如吴怀祺的《〈禹贡〉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想》则如凤毛麟角。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史学界的一些禁区被逐渐突破，大家

① 收入吕振羽等著：《中国历史论集》，厦门东方出版社 1945 年版。
② 桂遵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倾向于将学术和政治分开，突出表现在对非唯物史观派的史家和史学的研究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特别是对陈垣、傅斯年、陈寅恪、吕思勉、钱穆等学人的研究，学术界思想趋于活跃。其他如对柳诒徵、缪凤林、雷海宗、林同济的研究也有一些文章面世，但从民族主义角度进行研究的，似乎还不多见。不过，对抗战时期的史学思潮进行宏观或微观的考察，已经有一些研究者走在了前面，如王学典的《20 世纪中国史学评论》收录了数篇涉及抗战时期中国史学的论文，张书学的《论抗战时期中国史学思潮的转变》等等。

以民族主义为切入点，开展抗战时期的史家和史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社会意义。

首先，研究抗战时期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潮，有助于深化史学史的研究。史学作为一种观念文化，历来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中国史学在由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化的过程中，先后兴起过各种各样的思潮和流派，如经世致用史学思潮、“新史学”思潮、国粹主义史学思潮、疑古史学思潮、“新考证”史学思潮、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等等。这些思潮各自独立而又相互影响，各种思潮、流派间的分合，既有治学旨趣、方法的歧异，也有曲折隐晦的政见不同，但无不与中国近代社会现实息息相关。

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史学以“求真”为尚还是以“致用”为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历来是见仁见智。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潮无疑是经世致用史学思潮在抗战时期居于主流地位的反映。不可否认，民族主义史学思潮的勃然而兴，冲淡了史学的“求真”旨趣，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史学的科学性；史家在高扬“经世致用”精神、完成其社会使命的同时，也使学术

本身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因此，认真研究抗战时期民族主义史学思潮形成的机制，考察各流派的观点、方法，比较其分歧和共识，对我们准确把握中国近代史学的特征，认识史学和社会现实的双向互动关系，有着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其次，研究抗战时期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潮能够深化中国现代思想史的研究。民族主义是中国近代以来最重要的社会思潮和学术思潮，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在将来，它都有着不可替代的精神价值。就其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看，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西方文化更以咄咄逼人的态势，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强大的冲击，国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对此，作为学术工作者，我们必须有所回应。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对广大人民尤其是青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传统教育，变历史遗产为思想财富和精神动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都具有十分重要和迫切的现实意义。

鉴古可以知今。抗日战争离我们并不算遥远，尚不能以“古”视之。众所周知，战后日本右翼势力一直拒绝承认日本侵略亚洲邻国的战争罪行；中国国内的青年一代对那场战争只有一些概念性的认识，可见，从多角度反思这段历史，加强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仍然极有必要。为了争取民族的独立、解放，为了争取祖国的进步、富强，前辈们抛头颅洒热血，无私奉献，以他们的生命和鲜血实践了伟大的爱国主义；而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中国史学家群体，在民族危急存亡之秋，以“书生报国”自诩，以笔代剑，为抗战救亡事业呐喊助威，不仅为振奋民族精神、鼓舞民气做出很大的贡献，更为后人留下了大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值得世世代代珍视并发扬光大。

再次，研究抗战时期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潮，可以拓展抗日战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争史的研究领域。抗日战争是 20 世纪 30 年代至 40 年代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一场殊死较量。双方的竞争不单在军事方面、经济方面，更表现在民族心理方面和文化方面。 60 年来，抗日战争史始终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人们用各种方法，从各个角度、各种层面对之加以研究，一方面说明它对当代中国的价值相关性，另一方面也表明它的极端复杂性。抗战时期的历史学作为抗战文化的一个重要领域，不仅是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国民心态的实录，而且作为一种有影响力的“精英文化”，对当时社会各阶层的思想和行为也有着不可小视的伟力。史家和史学如何受时代的影响，当时的各阶层各群体又怎样接受历史学的影响，这种影响的途径如何，机制如何，效果如何，都值得认真探究。

最后，研究抗战时期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潮，将有助于深化知识分子在社会变革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的研究。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与普通民众不同。普通民众的爱国多出于朴素的情感，不可能上升到理性的高度，他们对于“国家”、“民族”之类的概念往往是模糊的，片面的；而知识分子对国家和民族的理论有着深入的研究，并对世界上许多国家、民族的兴衰存亡进行过大量的分析，因此，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不仅仅出于对江山故土的热爱，更有着许多理性而系统的思考，有着丰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内涵。正是因为他们有着常人不及的恢弘视野和思想深度，他们的民族主义才摈弃了狭隘的个人、家族或小集团的观念，而能够集中反映整个民族的利益和需要。①

①参见黄敏兰：《学术救国——知识分子历史观与中国政治》第一章“引论”，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历史学家是知识分子中最富于忧患意识的一群，对历史的深刻体认，使他们对现实也有着更为敏锐的洞察。他们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由于各自的阶级属性、政治倾向以及个性特征不同，决定了他们对历史的理解也是多种多样的。就抗战时期的民族史家而言，由于他们对爱国的内容、途径、方式的理解有差异，反映在史学思想上自然也大不一样。本书就是要研究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各派别史家在“爱国”这个核心问题上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厘清其源流，把握其脉络，观其共识所系，察其分歧所在，总结其成就，分析其误区和局限，从而更深刻更全面地认识抗战时期的史家和史学，探寻史学和现实的相互作用机制，为繁荣历史科学，为培育国民的民族精神做出历史学者应有的贡献。

必须指出的是，抗战时期的爱国主义史学是多层次的。不同的阶级、阶层、党派对抗战救亡的理解不尽一致，这里只有惟一的标准可资评判：即看其是主张抗战，还是主张妥协求和。就整个抗战时期，凡是主张抗战的，都是爱国的，至于其政治主张如何，可以不问，须知：在强敌压境，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之秋，将日寇驱逐出中国领土以争取民族的独立解放就是最大的“政治”。所以，抗战时期各阶级党派为了共同抗日，可以捐弃前嫌而达成合作；一俟亡国危机过去，尤其是国际形势发生变化，抗战胜利的前途已经明朗化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国民党亲英美派，便转而采取消极抗日的态度，以静观国际形势的变化，而积极从事“溶共”、“限共”的反共摩擦。反映在文化战线上，爱国主义史学在抗战中后期就发生了裂变和转型，因强敌压境而一度退居幕后的分歧和矛盾再度凸现出来。是维护国民党一党独裁，建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国家，还是开放政治，

实行社会民主，建立容纳各抗日党派的联合政府，则成为真假爱国主义的界标。因此，只有按照历史主义原则，用唯物辩证法的方法，来分析评价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潮，注意其层次性的差异和阶段性的变化，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不同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社会思潮的转向，做到“不虚美，不隐恶”，才有可能得出接近真实的判断。

笔者的意图，是把抗战时期主张抵抗的史家置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的爱国主义史学范围中加以剖析、比较，以期获得对抗战史学有比较全面的认识为此，笔者力图避免先入之见，让史料说话，做到论从史出，史论统一，给历史人物及其思想主张以应有的历史地位，一切评判都基于强敌压境、全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而一致抗敌的特定历史环境，力求客观公允。特别要指出的是，业师吴泽教授，是民族抗日战争的亲历者、参加者，从吴老多次富有启发性的教诲中，从吴老爱憎分明而富有感染力的回忆中，笔者获得了不少珍贵的感性认识，这对于笔者能比较准确地把握抗日战争的时代特点，厘清当时史学界的复杂头绪，都有莫大的帮助。对吴老的教诲，弟子永志不忘！

史学界的前辈及时贤已经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学研究上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这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本书的一些观点直接是在借鉴他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这些学术成果的引用，绝大部分已在文中注明，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 第一章　炮火中的史家和史学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在风云际会的近代中国，史学的成就堪称时代精神的重要体现。史学和时代思潮交相辉映，成为社会变革的先导。就史学学术而论，近代以来兴起的各种史学思潮，如新史学思潮，科学派史学思潮，文化保守主义史学思潮，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等等。呈现出一派“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可谓名副其实的“思潮”：潮过即落。但透过各类史学思潮，我们不难发现：种种史学思潮背后都隐隐约约有一条主线，那就是“爱国主义”,或曰‘民族主义”。可以这样说,爱国主义史学思潮是近代中国史学发展最重要的脉络之一。正如梁启超所说：“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① 爱国主义就是这样一种思潮，它响应时代的召唤而崛起，并一再激发起无数志士仁人，为祖国的独立和富强而前仆后继。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 40 年代，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入侵，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生存危机，爱国主义也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顶峰。与其他知识分子群体相比，面对中华民族蹐天踏地的跌宕，史学家们有着别样的感受

①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433 页。

和体认，从而有了更为强烈的反映。

## 第一节爱国主义与民族觉醒

### 一、“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辨析

有人说，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已是大势所趋，各民族、国家间的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和深入，民族、国家间的界线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日益模糊。在这种背景下再提倡什么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似乎已不合时宜，甚至是逆世界潮流而动了。但笔者对此不以为然。道理很简单，倘使一国国民缺乏自尊自信的民族精神支撑，则如同一个人只有躯壳而没有灵魂，何以立国于世界？因此，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后进国家要奋起直追，民族精神不可须臾或缺，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则有赖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大力提倡。

民族精神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发展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民族性格、民族心理和民族传统的升华；它集中地表现着一个民族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所遵循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它不仅是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而且是推动民族不断发展和创新的内在动力。

一个人如果只有躯壳而没有理想和追求，那就成了行尸走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民族精神作为精神支柱，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一个民族要获得独立和统一，要获得生存和发展，必须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而作为“民族魂”的民族精神，则是形成民族凝聚力的思想核心。一个民族的精神状

态如何，关乎民族的兴衰成败。五千多年的中华民族史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的兴衰，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强弱，除了物质因素的作用外，思想文化因素是很重要的。在一定情况下，思想文化因素特别是作为民族凝聚力思想核心的民族精神是否得到弘扬，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强弱起着关键作用。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历经磨难而不衰，饱尝艰辛而不屈，千锤百炼而愈加坚强，靠的就是强大的民族精神。在中国历史上，每当国难当头，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重要时刻，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便成为激励中华儿女力挽狂澜、战胜强敌的精神火炬。

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所谓民族主义，就是一个民族对本民族的文化和历史的一种自我肯定和钟爱，是一个民族对自身存在的价值的肯定和推崇。民族主义认为对国家的忠诚是政治效忠的一种集中表现，而且是一种无条件的效忠。正是出于这种效忠，当一个民族处于被压迫、被剥削、被侵略和被奴役境地时，民族主义思想、情绪就会自然地成为这个民族反抗压迫、反抗侵略、争取独立的伟大动力。

然而，民族主义的效忠性也造成了一些人类的灾难。当民族主义思潮是以惟我民族独尊、惟我民族优越、其他民族都是劣等民族为内涵时，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必将导致排他性、甚至战争。二次大战时期，德国法西斯以日耳曼民族是高贵和优等民族为口号，煽动民族情绪，作为它发动侵略战争的思想基础；在亚洲，日本军国主义也是以大和民族优越感，视中国人为路边“小石头”，作为它发动侵华战争的基础。这种排他性的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潮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①。可见，民族主义在历史发

①李永明：《民族主义的历史与发展》，新加坡《联合早报》 2000 年 1 月 25 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展中有其积极作用，也有其消极作用。

爱国主义是民族主义发展的产物，是一个国家里的各民族肯定这个国家对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价值的那种情感和观念。爱国主义首先是一种情感，这种情感是长期文化心理的积淀；进而凝结为一整套观念系统，它“表现为人们对江山故土和骨肉同胞的深切热爱，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高度珍惜，对于民族和国家命运的休戚感、使命感以及为之奋斗献身的精神。”① 在本质上，爱国主义之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对那个国家的归属感，即把自己的现实存在与那个国家整合在一起，把国家的兴亡与自己的存在统一起来。

就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区别而言，在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中很明显地体现出来。近代许多政治学家都认为，大体上，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有三种：一是一个民族组成一个国家，二是一个民族组成多个国家，三是多个民族组成一个国家。在民族与国家的第一种关系中，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具有相同的含义；在第二种关系中，民族主义不仅具有和爱国主义相同的含义，而且还具有促进一个民族多个国家向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发展的作用；在第三种关系中，爱国主义涵盖了民族主义的内容，而民族主义也就成了爱国主义的一种表达手段。② 而中国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现实则意味着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本质上就是爱国主义，特别是面临外敌入侵的时候，两者基本上就是同义语。

① 李文海主编：《中国近代爱国主义论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第3页。

② 关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异同，学术界一直聚讼纷纭，单是国内学术界的讨论就极其复杂，参见李世涛主编：《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这里从陶绪先生的观点，参见陶绪：《晚清民族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8 页。

狭隘的、极端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惟我独尊、以坑害其他民族为目的，而不是视各民族为一律平等之民族；爱国主义是以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反对强加在一个民族头上不平等的待遇或为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为基础的。因此，在本书中，笔者在相同的含义上交替使用这两个概念。

二、空前的民族危机催生空前的民族觉醒

中华民族富有爱国主义优良传统。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发展史上，爱国主义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为民族和国家的生存发展而奋斗不息。在古代中国，爱国主义集中体现为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传统以及反抗民族压迫和外族侵略的传统。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不断在忧患、抗争和求索的过程中得以发扬光大，进入了新的更高的精神境界。纵观中国近代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爱国主义始终代表着时代的主旋律。“从夷夏之辨到反帝救国，从恪守传统到面向世界，从皇权主义到民权主义再到社会主义，这就是爱国主义的内涵一百多年来新陈代谢的基本轨迹。”① 一部中国近代史，既是一部中华民族被侵略、被欺辱的历史，又是一部全民族觉醒、要求解放的历史。

历史表明，中国的民族危机越严峻，中国人民就越团结，民族主义就越高涨。

一百多年来，尽管中国人民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国家民族的生

①李文海主编：《中国近代爱国主义论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 页。

存危机，尽管中国人民富有爱国激情，但是，中国毕竟数度将亡而未亡，从而使相当一部分国人产生了苟安思想，认为中国以如此广袤的领土，如此悠久的历史文化，如此丰富的人力，根本不可能亡国。这就像“狼来了”的故事一样，八国联军没能灭亡中国，日本的“二十一条”也不能灭亡中国。国人的这种自恃不亡的心态，近代有不少学者指出过。如柳诒徵：“自袁世凯以来，所抱持之中国不亡之乐观，专恃各国牵制之势力，以为苟且图存之计，一转而有列国共管之说，又一转而有九国远东之约，而收回胶澳收回旅大退还赔款等事，国民闻之，且欣然色喜，谓吾国势且将由此隆隆日上焉。”① 著名报人张季鸾也尖锐地指出：“中国之所以不振，首因地大物博，自恃其不可亡，故萎靡散漫，不能前进。即以对日论，三十年来，经数次之巨创，而犹不知奋，甲午之败，庚子之危，二十一条之羞，济南惨杀之痛，此在当时，皆不可忍。不可忍者，而事过境迁，又复忘之。政治之纷纠，风俗之颓废，转年甚一年，虽经两度之革命，而不能破沉疴涤旧污，此岂吾民之果健忘哉？徒以自恃其不可亡，而未真切感觉危险之故耳。”

然而，这一次，狼真的来了！“九一八”隆隆的炮火，惊醒了国人“中国不亡”的美梦。“半载以还，张皇应付，朝野束手，除呼吁国联外无外交，除坐待来攻外无战法，三省皆沦陷，淞沪成焦土，……国家之可危可耻，百年以来，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②

空前的民族危机，终于激发起全民族空前高涨的爱国热情。

①柳诒徵：《自与他立》，《学衡》第 43 期，1922 年。
②张季鸾：《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序”，大公报出版社 1932 年版。

尖锐的阶级矛盾被更加尖锐的民族矛盾所掩蔽，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入侵，中国社会各阶层各党派无不义愤填膺，同仇敌忾。

中国共产党是不折不扣的民族主义者。“九一八”事变后，苏联掌控的共产国际无视日本欲灭亡中国的事实，把日本侵华视为侵苏战争的前奏。“国际”在中国的政策执行人竟愚蠢地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①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在与“俄化”倾向斗争中，开拓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道路，为民族的独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说出了绝大多数国人的心里话：“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她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②

一些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也纷纷发表抗日宣言，表现出鲜明的爱国立场。

农工民主党在其《临时行动纲领》中指出：“今日中国的半殖民地的历史行程已走到了最后一步了，中华民族存亡的命运，就在这一步的行程之中决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或是

①参见罗福惠主编：《中国民族主义思想论稿》第七章，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②《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俯首帖耳，从此让日本帝国主义者编入奴隶籍中，或是将现在的半殖民地的桎梏打破，还我自由，二者之中，必择取其一，再无中间的路可走了,更没有徘徊犹豫的时间了。”①

史量才、张季鸾、邹韬奋、王造时等民主人上坚决呼吁抗日救亡。邹韬奋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是愿不愿亡国的问题，是整个中国存亡的问题。’② 王造时也认为，面对日本侵略，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屈服而亡国，要么抗争而生存一个人如果失掉自信力，自己看不起自己，必定自暴自弃，一个民族也是如此。为此，他主张提倡国家观念，恢复“民族自信力”，建立起“精神的国防”，因为“惟有全民族的反抗，才能免于全民族的消亡，惟有民族自信力的恢复，才能鼓舞全民族的反抗’③

宋庆龄、沈钧儒、马相伯、章乃器等人于 1936 年成立了包括文化教育、新闻出版、法律、戏剧各界的文化精英在内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张全民族团结御侮。以邹韬奋的话就是：这个抗敌救国联合阵线，“就是不论何党何派，不论什么阶层，不论什么职业，不论党派和阶层，凡是不愿做亡国奴的，都联合起来,集中整个民族的力量来对付我们民族的最大敌人。”④

爱国文化人士还创办救亡报刊，传播民族主义。影响较大的

①《农工民主党临时行动纲领》，见陈竹筠等选编：《中国民主党派历史资料选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03 页。

②原载香港《生活日报星期日增刊》第 1 卷第 6 号（1936 年 7 月 12 日），（韬奋全集》第 6 卷，第 593 页。

③ 王造时：《惟复民族的自信力》，《荒谬集》，自由言论社 1935 年版，第 236 页。

④邹韬奋：《不是创刊词》，原载《生活星期刊》第 1 卷第 12 号（1936 年 8 月 23 日),收入《韬奋全集》第 7 卷，第 9 页。

有《大众生活》、《读书生活》、《民族战线》、《大众知识》、《世界知识》、《时代批评》、《东方杂志》、《大众论坛》等等。

要而言之，在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的侵华战争中，一切有爱国良知的知识分子都纷纷走到时代的前列，为唤醒民众投身于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而摇旗呐喊。侯外庐回忆说，“那个时代，像胡适那样躲到美国去做学问的人毕竟寥寥无几，消沉者不能说没有，但砥砺志气，发愤为中华民族振兴而勤奋工作，切实研究问题的人，毕竟占绝大多数，完全不窥国事，把民族存亡置若罔闻，绝对超然乎政治之外的学者，我没有见到过一个。”①

其实侯外庐对胡适的这个评价，是在特定的政治条件下的评论，并不客观。胡适在“五四”时期主张西化最力，给人的印象似乎不甚爱国。但要知道，在那个时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相信，要爱国，就要抛弃传统文化，中国要富强，必须取法西方。激烈地反传统，恰恰是爱国的表现。胡适原本不打算从事政治，但在国难当头之际，他慨然出任中国驻美大使，为的是争取国际舆论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争取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所做的努力和成绩都是不容抹煞的。退一步说，即使胡适有值得非议之处，也还是愿意为国效力的。而胸怀史学所以经世信念的爱国史家们，更时时以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为念，以自己的历史研究和著述服务于伟大的民族抗战。

①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 1985 年版，第 127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